

特别策划

向毛泽东学习战略预见

■郝敬东 熊玉祥 牛玉俊

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日。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高瞻远瞩,把握大势,成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预见范例,形成了科学的战略预见思想。今天,学习毛泽东战略预见的思维、方法,对于提高战略思维水平和战略指导能力,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

毛泽东深刻指出:“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这就是战略预见的本质和价值。

战略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战略预见即超前认识、前瞻思维,是一种“事先知道”“合理设想”。毛泽东认为:“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才叫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1930年,毛泽东为纠正一些同志的悲观情绪和错误思想,预断“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很快走向高潮,并形象地指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的一个婴儿。”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战略预见。

战略预见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战略指导源于战略预见,核心是战略预见。如果缺少战略预见,将会带来盲目性,减弱其实践指导价值,指挥员可能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毛泽东强调,如

果对战争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就“只能跟着战争打圈子,让战争把自己束缚起来”,陷入被动。他还生动地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因此,战略指导应未雨绸缪、见微知著,以增强主动性、计划性、灵活性。

战略预见具有动员、鼓舞作用。科学准确的预见能够激励群众,增强斗争的信心和热情。这是战略预见的功能,也是毛泽东战略预见的鲜明特色。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预见力,在澄清“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中,做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见;在消除“亡国论”的悲观情绪中,做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正确预断,等等。这些科学的正确的战略预见,超越时空,气势磅礴,“使大家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前途”,坚定了信心、鼓舞了人心、振奋了精神,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顽强意志,对夺取伟大战争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

毛泽东认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这是进行科学战略预见的依据和前提。

战争有规律可循。战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殊领域,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定性。历史上大多数军事家坚持不可知论,认为“战争是蒙着一层阴影的科学”“一切科学都有自己的原理,惟有战争还毫无道理”“在战争问题上,一个人永远无法有把握地预测上帝是怎样安排的”等。截然相反,毛泽东提出军事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强调“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因此,战略预见就有了客观基础。这是毛泽东在战略预见上的一个重要观点。

大方向大趋势是可以认识的、预见的。毛泽东是唯物主义者可知论者,他在提出战争是有规律的基础上强调:“在目前条件看来,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他把战略预见的重心放在战争趋势、形态、进程、结局等未来大趋势上,对大略、要点进行超前认识和判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指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方向;在抗日战争时期,描绘了持久战三个战略阶段的大轮廓;在解放战争时期,绘制了战争进程全盘的大图样,等等。这些“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一开始就为战争的全局、全过程、结果指出了大方向,有利于对整个战争加以把握和控制,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难以预见事物发展的全部细节。毛泽东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今天要把将来的事情统统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他在预见抗日战争持久战时直接指出:“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个中日战争的‘流年’来。”因此,战争极为复杂,战场情况多变,具体细节难以预断,只能进行“大体的计算”,说出大方向、描绘大轮廓。

相反,如果不能辩证地看待,不承认不确定性,认为战争的详细过程都可以预见,那么必然走向唯心论。毛泽东还强调,预见不容易,准确预见是相对的。偶然性可能带来偏差,预见失误也不可避免。要认识到这种局限性,不断校正预见结论。

“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总是比别人站得更高、望得更远、看得更准,所以“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他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的联结到全体,形成独具特色的战略预见思维、方法。

坚持客观全面。毛泽东认为,只有“采取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反对“只看见局部,看不见全体,只看见树木,看不见森林”。战略预见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思考程序,应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战略全局、最终目标为起点。必须先见林、后见树,甚至可以说,只要能先见林,即使看不清每一棵树,对于战略预见而言,也不一定会产生严重影响。这与一般人往往只看见或先看见树、看不见或后看见林,恰恰相反。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的战略预见之所以正确,就在于是客观地“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

抓住事物本质。认清和抓住了事物本质,就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毛泽东强调:“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作人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并进一步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战略预见作为一种超前认识,只有揭示事物内部联系的规律性,掌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才能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不为美

苏严重对抗的表象所迷惑,指出美苏不会开战即为一例。

分析各种矛盾。毛泽东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其中,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起主导作用,决定发展方向。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正确预见,就是建立在“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的基础之上。他还强调,“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含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唯如此,才能处变不惊、处事不慌、留有余地,随时灵活处置各种情况。

把握时代特征。鲜明的时代特征直接影响事物的发展方向,“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毛泽东把中国问题放在一定的国际背景和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科学预见的基本依据。他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指出,虽是敌强我弱,但这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的时代,“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正是毛泽东把抗日战争看作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才科学预见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战争结局。

着眼长远态势。长远性是战略预见的内在要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强调,“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战略指导的要义是预防,如果领导者缺乏预见的长远性,指导实践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徘徊,行动就带有盲目性。因此,战略预见必须着眼未来、重视长远。

列宁在《预言》一文中指出:“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总结学习毛泽东的战略预见思想和实践,仍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缜密者胜

■胡建新

群策集

战场上,任何的漫不经心和粗枝大叶都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乃至彻底失败

1930年5月,阎锡山和冯玉祥结成反蒋联盟,发动讨伐蒋介石的中原大战。为集中兵力消灭蒋介石在河南的有生力量,阎冯召开联席作战会议,研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决定双方各派一支精锐部队,在河南沁阳会师,合围聚歼驻扎在河南的蒋介石部队。会后,冯玉祥的作战参谋很快拟定了一份作战命令,令部队昼夜兼程直插沁阳,与阎锡山部会师。谁知,作战参谋粗心大意,误将“沁阳”写成了“泌阳”。偏偏河南真的有个泌阳,那里是蒋介石重兵把守之地。结果,冯玉祥部进入蒋介石的重兵包围圈,幸亏撤退及时才免遭重创,但原定的作战计划即完全泡汤。

就是这一搬之添、一字之差,导致阎冯联军措手不及,整个作战计划告吹。尽管那个粗心参谋事后受到军法处置被枪决,但阎冯联合讨蒋作战却已然失败。一场本可能赢得胜利甚至改写中国历史的战争因为一字之差而功败垂成,这样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代价太沉痛。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事之成败,必由小生。战争,往往以敌对双方智力的对抗和博弈为前提。智力的核心是思维,智力的高下首先体现在思维是否缜密上,而思维是否缜密又体现在工作上是否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战争是一部结构复杂的庞大机器,任何一个零部件的安放都必须严丝合缝、衔接紧密,兵力的部署、火力的配置、部队的协同、重装备的运用等,都必须经过缜密的思考、精细的筹划、精确的计算、精准的部署才能完成,不允许有丝毫粗疏和懈怠。

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作战领域,未来战争对作战筹划与部署、兵力配置与协同、火力打击与联合等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细化、精密化、精确化要求。比如,“阿尔法”人工智能软件可以在分析战场所有传感器数据后不到1毫秒的时间内做出决策,反应速度是人类的250倍。这些足以对人类认知度构成“降维”打击的先进技术,庶几颠覆了传统的战争形态和作战模式。它要求运筹多维战场、操纵先进武器装备的指挥员们必须思维缜密、作风严谨、操作精准,绝不能出现丝毫差错和疏漏,任何的漫不经心和粗枝大叶都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乃至彻底失败。

粗枝大叶不仅是一种粗疏懈怠的工作态度,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其危害性早已不言而喻。军队的根本职能是打仗和准备打仗,无论是平时训练还是临战准备,无论是拟制作战计划还是进行实战部署,都必须培养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倾心尽力做好每一个技节、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力戒心浮气躁、分心走神、丢三落四。要从一件件具体小事、看似不起眼的事情做起,把关乎战争成败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十分细致、精致,力求做到极致。譬如,拟制作战文书,一定要字斟句酌、精研细磨,要有为了“吟安一个字,宁可捻断数茎须”的劲头。文书拟制好了,还要认真仔细地反复校对和审核,不轻易出手。据说,一家出版社有位资深职业校对,为避免一些常用词句被顺着跳过去而发现了差错,干脆将整部书稿或整篇文章倒过来,从后往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结果创造了从事校对几十年无任何差错的“绝对准确率”。这种严谨细致的作风值得每一名部队指挥员好好学习。

严寒不可不练兵

■王光远

挑灯看剑

严寒天气对作战行动影响极大。有试验数据表明,当气温降至零下20至30摄氏度时,部队作战效能将下降40%至60%,以至于古代军事家把寒冬视为“禁战”季节。然而,战争从来不会选择天候季节。打仗不分季节,练兵也就不分寒暑。应对未来作战,应重视严寒条件下练兵,提升严寒实战能力,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员和武器装备战斗效能。

锤炼“胜寒”之气。拿破仑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精神,从长远说,精神总能征服利剑。战场上,不仅是指挥水平、武器装备、技术战术的交锋,更是精神和意志的较量。只有把艰苦环境、复杂困难当成磨刀石,练就“受得战场千般苦”的品质,才能适应战争并赢得战争。历史上,岳家军的战斗力之所以强大,就在于他们坚持“滹沱雨、大雪降,狂风怒之日,正是练兵之时”,把军队练得什么苦都不怕、什么苦都能吃。

摸透“耐寒”之性。严寒条件下训练,应突出严寒环境中人员和装备的适应性、耐寒性训练。通过训练让官兵熟悉掌握防冻伤措施,增强身体抗寒机能。加强武器装备特别是信息系统装备、电子设备、指挥控制系统等操作技能训练,让装备操作、维护、保障等都能适应严寒作战环境。注重严寒条件、风雪天气条件下装备作战数据的采集,对装备的机动速度、杀伤半径、射速威力等作战性能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的检验论证,建立和完善装备严寒条件下作战数据库,摸透严寒条件下武器装备的“脾性”。

巧用地利持重待机

——直罗镇战役的制胜启示

■刘箭章

1935年11月初,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第67军共5个师3万余人从东西两侧,企图合围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的红军。紧急关头,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歼灭战。从11月21日开始,直罗镇战役历时4天,歼灭东北军第57军109师及106师617团,击毙敌师长牛元峰以下1000余人,俘虏5300余人,缴获各类枪械3500余支、战马300匹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整个战役,红一方面军伤亡800余人,郿县游击队伤亡50余人。直罗镇战役,是1935年11月初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在陕北会师、中央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取得的第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使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直罗镇战役给予我们许多重要启示,除战略决策正确、战役准备充分、红军内部团结、官兵英勇、群众支持以外,还有以下三个要点。高度重视运用有利地形,全面掌握战场主动权。直罗镇,位于陕西省郿县(今富县)县城西45千米,陕北通甘肃的大道从镇中通过,通达条件比较好,镇南为旗杆山,镇北葫芦河谷地宽数十米至200米,北侧为柏山,镇子和河岸阶地均在两侧高地严密控制之下,地形有利于伏击,易攻难守。在此次战役

指挥中,毛泽东高度重视掌握战场环境优势,充分利用地利提升战斗力。11月18日,毛泽东在张村驿主持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役动员与部署。会后,毛泽东和彭德怀带领与会干部先后两次前往直罗镇,现场察看地形,研究确定作战部署。研究中,毛泽东认为指挥员们使用的战场地形图比例尺偏小,不能详细反映地形情况,指示各军团组织测绘战场大比例尺地形图。各军团于19日至20日选派测绘骨干抢测了直罗镇地区大比例尺地形略图。毛泽东是运用地利克敌制胜,善于研究地理、军事地利的大家。在此次战役指挥中,他亲自带领指挥员勘察战场地形,布置地形图的测绘和应用。正如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后总结中所强调指出的:“没有团长以上的地形观察与地形图测绘,便不能布置得这样适当,打得这样漂亮。”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再次说明掌握地形、地理是确立军事战略、作战指挥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工作。

集中优势兵力,持重待机,防止轻敌麻痹。这次战役中,红军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寻求有利条件下的作战,避免不利条件下的作战”等作战原则,分割敌军,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伏击战中歼灭敌人。直罗镇战役前,红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取得劳山、吴起镇、榆林桥三战三捷的胜利,沉重打击了东北军的进攻势头。红军一方面夺取了战场主动权,获得补充,士气大振,同时在一些部队中也出现了轻敌情绪。在11月5日甘泉县下寺湾军事会议上,有些指挥员认为东北军不堪一击,提出乘胜出击,进攻南翼连吃败仗的敌第

67军;有的认为可以兵分两路,一路南攻,一路打击北翼陕北军团并越秀、高桂滋部。毛泽东指出,东北军作战失败的原因,恰恰是由于轻视红军,因此在不掌握苏区地理形势和红军部署的情况下分兵冒进,所以吃了败仗。毛泽东认为要尽快打破东北军的“围剿”,红军一不能分散兵力,二要集中以东北军为作战目标,三要坚持诱敌深入寻机歼敌。毛泽东的分析,统一了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认识,及时杜绝了轻敌麻痹情绪,避免了“因骄而败”的可能。

充分掌握敌情,因敌施策,大胆用兵。了解敌情、因敌施策,改变我变、量敌用兵,是毛泽东指挥作战的基本策略。11月5日,毛泽东等领导在团寺湾军事会议上,详细听取红15军团作战的前期作战情况介绍,全面了解东北军的战斗力和高级军官特点,据此判断东路之敌第67军遭重创后会十分谨慎,诱其再次上攻比较困难,而西路之敌第57军尚未吃够,部分高级将领还很骄狂,诱其深入创造战机的可能性大,进而决定集中兵力,设计引诱西路之敌第57军东进,在其前进方向上选择了地理上易攻难守、有群众基础的直罗镇伏击歼敌。在红一方面军精心布局引诱下,东北军骄兵冒进,其第57军军长董英斌于11月17日奉命出动,第109师师长牛元峰误判

直罗镇一带设有红军主力,于11月20日上午兵分三路在6架飞机配合下向直罗镇攻击前进,下午第109师5800余人进占直罗镇,按红军指挥员的设计进入了“口袋”。

作战中,红军非常注重从俘虏的东北军军官处获取情报。例如,从曾担任过张学良警卫营长高福源口中得知第57军、第67军高级军官的很多情况,以及东北军与西北军、陕北军团之间的矛盾,准确判断牛元峰会孤军冒进、董英斌会龟缩撤退,东北军吃紧时西北军和陕北军团肯定见死不救,从而敢于将红一方面军集中一地歼敌一路,敢于只派地方武装牵制、阻拦其他方向的敌军,敢于以约1万人的兵力攻歼、追击近2万人的董英斌集团,从而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直罗镇战役堪称巧用地利持重待机的典范。孙子曰:“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红军利用地利取得作战胜利的实例很多,如四渡赤水、遵义战役、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以及保卫、巩固陕甘苏区的山城堡等战役中,红军都预先测绘了作战地区的详略地图,有力保证了指挥员战前把握战场环境、利用地利巧妙部署兵力、指挥部队作战。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研史析理